

王善英 著

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韦伯理性化思想研究

【博学文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博文学库】

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 韦伯理性化思想研究

王善英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韦伯理性化思想研究 / 王善英
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64-0314-8

I. ①理… II. ①王… III. ①韦伯, M. (1864~192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547 号

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王善英 著

——韦伯理性化思想研究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 bnupg. com. cn
www. ahupress. com.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664-0314-8

责任编辑: 卢 坡 刘中飞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陈庆军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前 言

当今世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经济蓬勃发展、多元价值文化冲突日益激烈、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人类面临诸多的现实社会发展难题和生存困境,比如技术理性的双面性问题、人类精神信仰危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深思和研究。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社会,但现代化问题也首先暴露在西方社会。目前看来,现代化问题早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它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重大课题。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突飞猛进,许多理性化和现代化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并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国内外许多富有见地的理论成果,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摸清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找准现代化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有的放矢,以便在现代化进程中少走弯路。在这些理论成果中,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思想就不可忽略。众所周知,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博大精深。有些研究者称其为“现代性的诊断者”,毫不为过,他对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理性化矛盾的精彩论述切中了现代化命题的要害,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忧虑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现代化或理性化发展的规律、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都大有裨益。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韦伯理性化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许多研究者承认韦伯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性化问题,进而对理

性化的内涵、分类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对理性化和人类生存境况的关系,即韦伯对理性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关注得不够。与其说韦伯思想的核心是理性化问题,倒不如说是“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问题。本书将韦伯的理性化问题与人类生存境况紧密结合起来,以韦伯的研究路径和话语体系为出发点,从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四个层面全面梳理和评价韦伯的理性化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韦伯理性化思想的生存论意义和深厚的人文意蕴,从而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把握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而且有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应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挑战。

韦伯被认为是新康德主义者,他承袭了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海因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等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是有区别的,这决定了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的不同。韦伯认为许多社会现象中存在的文化意义是无法根据以往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衡量和把握的,理解和诠释是把握文化意义唯一的途径,基于此,韦伯通过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对社会实在问题进行分析,来把握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的价值意义。韦伯理想类型的建构为其对资本主义实在问题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托,也为韦伯之后西方社会理论者提供了一种问题分析纬度,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确立了研究方法之后,韦伯设置了理性化问题分析的话语体系,即以社会行动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它在韦伯整个思想体系中起到提纲挈领式的作用。他对社会行动作了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的划分,目的理性式与价值理性式行动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范畴,而情感式和传统式属于非理性的社会行动范畴。为了更好地表达目的理性式与价值理性式行动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韦伯又引入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概念。在文化领域,韦伯惯常使用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而在社会制度层面,韦伯一般运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

生与发展就是人类行动由非理性向理性逐步发展的进程,理性化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这一理性化的进程中,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产生了矛盾。韦伯就是通过这两对矛盾来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境况的,它体现在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四个方面。

肇始于新教伦理的西方文化理性化对人类生存境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西方社会之所以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在动力,表明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是韦伯通过东、西方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实际影响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文化理性化产生了现代意识结构,导致了文化统一性意义的丧失以及人类生存意义的丧失,随之而起的是多元化价值对立的局面,这是社会行动渐趋理性化的结局,是目的理性日益强大而价值理性日益萎缩的结果。显然,韦伯夸大了文化理性化对人类生存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正因此,他被称作“文化悲观主义者”。经济理性化体现在理性的经济行动以及理性的货币和资本计算上,它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宗教、政治和法律的作用不可忽视,而西方城市的独特性以及货币和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也是西方经济理性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传统生产条件相比,经济理性化具有固定资本、自由劳动、理性的劳动专门化与劳动结合、纯粹流通经济的劳务分配,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营利经济基础上的理性经营等根本特征。资本主义经济达到了高度形式理性化的程度,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这导致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改变。同时,严密的经济机制也将人类牢牢地束缚于其中,导致人类的异化状态。有效需求和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计划经济和流通经济的矛盾则体现了形式理性经济与实质理性经济之间的矛盾。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经济与实质理性经济之间的矛盾会愈演愈烈,他一直坚持其文化悲观主义论调。西方政治支配形态也经历了从卡理斯玛支配到传统型支配再到现代社会中法制型支配的理性化进程,人类生存境况也随着政治秩序类型的改变而改变。在卡理斯玛支配下,社会关系全然是私人性

的,它以个人人格的卡理斯玛特质的妥当性和实证性为基础,它对应着韦伯对人的行为类型划分中的情感型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卡理斯玛支配的特点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在理性化大潮趋势的推动下,人类行为由非理性向理性发展,这决定了卡理斯玛支配必将被传统型支配所代替。在传统型支配下,支配者的权威不是因为个人的人格特质,而是依据传统的规则及其神圣性,这样,支配者权威的基础便从一种纯粹个人内在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外在的约束,但这种外在约束不是形式上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此种境况在现代法制型社会支配下得以改观。在法制型社会支配下,支配者的权威来自一种明确的理性法律规定,而不是来自某种人格特质或神圣传统,韦伯以官僚制为例来说明法制型支配的特点和影响。在他看来,官僚制支配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促进了人类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限制了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从而造成人类自由丧失的危险。而人类自由的丧失是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间矛盾的体现,这与文化理性化以及经济理性化的主旨一脉相承,成为韦伯思想的落脚点。自身就具有形式特质,又深受罗马法理性特质影响的西方法律也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向理性的发展进程,法的发明与法创制的方法,法律思维或法律教育的特点以及政治权力的干涉都成为西方法律向形式化、逻辑化特征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法律体系的建构对于处身其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双重性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保障人类的权益;另一方面对人类自由也形成一定的限制,即自由与限制并存。随着西方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发展,人类实质理性化的程度却在减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这使韦伯对法律理性化的判断与对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中理性化矛盾的判断相契合。

总之,在韦伯看来,文化理性化、经济理性化、政治理性化以及法律理性化在各自的领域对人类生存境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大行其道,而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却日益萎缩,这是理性化

的困境,也是人类在现代化阶段必须面对的生存矛盾,这是韦伯对理性化发展趋势和人类生存境况作出的悲观预测。韦伯何以如此悲观?

首先,这源于韦伯对理性化的内在矛盾设置了一种片面的关系模型,他忽视了理性化内在关系的辩证性,这是韦伯对理性化发展趋势持悲观态度的方法论根源。事实上,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以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发展以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发展为依托,同时又为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韦伯看到二者矛盾的方面并加以夸大,却忽视二者能够和谐、平衡发展的可能性。现代西方的社会理论者恰是认识到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平衡的可能性,才在批判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企图解决韦伯的难题,从而超越韦伯。

其次,韦伯的悲观主义还与他对人性的看法相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完整统一,正因此,在由理智以及理智而来的科技理性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人类才会感到痛苦和失落。第二,人是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统一体,人既有物质追求,也有价值追求,只有两者统一起来,才构成完整而健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高度发达、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相对减弱的现代社会里,人类要追问价值与自由的原因。基于此,我们要极力促进人性自身的和谐,既要使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人类行为中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又要使目的追求与价值追求相协调,从而促进人的完整性存在和全面性发展。

最后,韦伯深刻认识到“知识”的地位和功能在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理性化困境难以克服的又一因素。理性知识在现代社会丧失了其在古希腊时期那种具有通向真实生活之路、通向真实艺术之路以及通向上帝之路的全面性功能,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过分凸显、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性过分张扬以及自然科学迅

猛发展的结果。

韦伯理性化思想涉及的诸多现实问题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现实意义在于: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如价值失落、信仰危机问题,实质上与韦伯所揭示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问题相似,韦伯的思想启示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文化和价值领域的建设。其次,关于韦伯理性化与人类生存问题的研究,警示我们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更加关注人类生存问题,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发展,保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赢状态。(2)理论意义在于:首先,由于理性化问题本身既是哲学的问题,又是社会学的问题,还是生存论的问题,而韦伯的理性化思想既涉及哲学理论问题,又涉及社会的现实生存问题。本书将韦伯的理性化问题与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有利于深化理性化在哲学视域中的研究,也有利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把握韦伯思想的深层人文意蕴。其次,由于韦伯对理性化问题的深刻揭示以及由此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忧虑被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看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所以对韦伯这一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澄清韦伯对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

目 录

前 言	〔 1 〕
导 论	〔 1 〕
第一章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 ...	〔 21 〕
第一节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 22 〕
第二节 韦伯思想的话语体系	〔 31 〕
第二章 文化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 45 〕
第一节 文化理性化的缘起: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 伦理	〔 47 〕
第二节 文化理性化的对比性研究	〔 61 〕
第三节 文化理性化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	〔 88 〕
第三章 经济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 102 〕
第一节 经济理性化的特征	〔 103 〕
第二节 影响经济理性化的因素	〔 109 〕
第三节 经济理性化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	〔 126 〕
第四章 政治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 138 〕
第一节 政治支配及其正当性	〔 139 〕
第二节 卡理斯玛型支配	〔 142 〕

第三节	传统型支配	[149]
第四节	法制型支配	[157]
第五节	官僚制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	[161]
第六节	克服官僚制弊端的途径探求	[170]
第五章	法律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	[182]
第一节	理性法律的内涵及分类	[184]
第二节	法律理性化的进程	[187]
第三节	影响法律理性化的因素	[193]
第四节	法律理性化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	[206]
第六章	韦伯的悲观理性化思想及其根源	[212]
第一节	韦伯理性化思想中的悲观主义体现	[212]
第二节	对韦伯悲观主义的方法论解读	[216]
第三节	对韦伯悲观主义的人性论解读	[225]
第四节	对韦伯悲观主义的知识论解读	[232]
第七章	对韦伯与曼海姆理性化思想的比较	[242]
第一节	话语基础及概念内涵划分的比较	[243]
第二节	理性概念划分意义的比较	[245]
第三节	对理性社会发展前景预期的比较	[248]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65]

导论

一、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理性化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化内涵、分类等问题上,而理性化导致的人类生存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者没有将理性化问题与生存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正如高承恕所言:“往往在他精密的分析中,我们有时会忘记了在那理论性文字中的生活蕴涵。于是在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我们忙着找出他如何将宗教与经济连接的理路,却没有掌握到韦伯对西方人在近代整个生命情调转折的反省与体认。”^①高承恕先生无疑正确地指出了目前韦伯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即忽视韦伯思想中对人类在“近代整个生命情调转折的反省与体认”。更进一步说,忽视了韦伯思想的人学意蕴和人文情怀,忽视了韦伯对理性社会中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生存选择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研究,而这恰是本书要强调和

^① 张维安、瞿本瑞、陈介玄:《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页。

研究的部分重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理性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理性化^①内涵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都对韦伯思想中的理性化概念作过论述，因为这是正确把握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关键，这些研究者指出了韦伯“理性化”概念的多层次内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这一重要概念需要更为明晰和清楚的解说。

施路赫特(Schluchter)从人的认知能力、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以及生活态度的系统化三个方面概括了韦伯理性主义的内涵：

1. 理性主义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是习得经验知识及技能的结果，可说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2. 理性主义意味着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这源自文化人的“内心思索”：人们不但要求将世界看作一个充满意义的宇宙来把握，更必须表明自己对此世界的态度。这层含义下的理性可称为“形而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3. 理性主义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由于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可称为“实际的理性主义”。^② 施路赫特实际上指出了韦伯理性主义的三个主体和两个特征：三个主体分别是技术、伦理和生活态度，两个特征分别是科学化和系统化。但显然这三个主体却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主体，他对理性主义特征的概括也是不全面的。安东尼·克

① 理性、理性化及理性主义三个概念在韦伯的著作中都出现过，有时韦伯将其混用，许多研究者也因此而不加区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理性系英语单词 rational 或 reason，见吴景荣、程镇球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955 页。rational 指合理的、有理性的，见《朗文现代英汉双解》，现代出版社 1988 年版，1167 页。reason 强调思考、理解和组织能力，见《朗文现代英汉双解》，现代出版社 1988 年版，1173 页。理性化和理性主义分别系英语单词 rationalization、rationalism，理性化强调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理性主义指一种思想潮流。

②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隆曼指出了韦伯理性概念的四种内涵：1. 表示受一般性规则或原则的约束。2. 表示系统性。3. 建立在对意义的逻辑解释基础上。4. 可以为人类智力所把握的。^① 安东尼·克隆曼显然直接混淆了理性主义的主体和特征。苏国勋曾概括了韦伯“合理性”的四种含义：1. 表示有法律和法规所支配的事物，在此意义上，事物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是合理性的。2. 指法律关系的体系化特征。3. 用于说明基于抽象阐释意义的法律分析方法。4. 由理智控制的消除分歧的手段是合理性的。^② 苏国勋只是指出了韦伯理性主义的一个主体即法律主体，而这仅只是理性主义的一个方面而已。马尔库塞也曾描述过韦伯的“理性”概念的三种特征：1. 经验和知识存在着一种逐渐数学化的趋向，这是一种从自然科学极其不寻常的成功开始，扩展到其他科学乃至“生活行为”本身的数学化。2. 在科学和生活行为的组织中，对理性经验和理性证据的必要性的执著。3. 一种普遍的经过技术训练的官员组织的创始和巩固。^③ 马尔库塞显然也是混淆了理性主义的主体和特征，而且这些主体和特征同样是不全面的。

总之，这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部分主体和特征，而其他研究者也都存在相似的问题，即他们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把握是不全面和系统的。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又具有诸多特征。连韦伯自己都承认其理性主义含义殊多，他说：“若就体系思想家之于世界图像的理性观点而言，理性主义指：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理论性地支配现实。换一个观点思考，理性主义又可以是：以越来越

① 苏国勋、刘小枫等：《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76 页。

②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0—221 页。

③ [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79 页。

精确的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的达成一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①韦伯又说:“‘理性的’也可意指一种‘计划性的安排’。”^②韦伯指出了“理性化”的三种内涵:1. 理论体系上的抽象化和概念化。2. 现实行为的计算化。3. 安排的计划性。可见,韦伯的“理性化”概念至少有以下几个根本特征,即系统化、逻辑化、数学化或计算化、技术化、专业化,它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各个方面,构成韦伯所划分的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或实质理性。我们只有搞清楚理性主义的多重主体和特征,才能清楚把握韦伯的理性化思想,因为韦伯就是利用人的行为的理性化的分类以及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分类的特征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进程,进而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的。

(二)对理性化发展困境的研究

韦伯在其著作中揭示了理性化发展的困境问题——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问题,即在现代社会中,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高度发达而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却逐渐衰微,并不断被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所排挤这一状态。对此问题,许多韦伯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表述和理解: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矛盾”,如施路赫特;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限制”,如苏国勋;有人称之为“现代社会的困境”,如王威海等人。实质上,理性化的困境即现代社会的困境,亦即人类生存的困境,这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

施路赫特在《理性化的矛盾——韦伯论“伦理”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对理性化的困境曾有所揭示。施路赫特企图把韦伯的理性化分解在所谓的“世界图像”层次上进行重建,这种重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中的人类找到一种适合的伦理生活方式。施路赫特将这种重建限定在韦伯宗教伦理思想领域,运用伦理理

^①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2页。

^②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性主义、科学理性主义以及实践理性主义三种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解释韦伯的思想。他认为,韦伯“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舒适、不痛快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① 根据施路赫特的分析,韦伯认为人类在现代社会不痛快的理由就是在宗教被除味之后,在以神为中心的多元世界图像被打破,而以科学为中心的多元世界图像建构时,人类无法自由地在道德与效率之间作出选择。科学要处理好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必然要求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形塑世界,“但是,人类的意志并非完全自由的,它会发现形塑世界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人类意志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可说有两种意义,这种关系可以立于注重效率的‘理念’上,或是立于道德合宜性的‘理念’上面。在这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着紧张”。^② 由此,施路赫特在韦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又提出了适应伦理的观点,他把韦伯的信念伦理看作道德最大化的追求准则,而所谓的适应伦理则是效率最大化的行为准则,他认为二者都无法在现实世界中为人类找到平衡点。而责任伦理虽然能对效率与道德二者进行批评考量,但也不能解决这种对立。显然,施路赫特利用自身对韦伯理性主义内涵的分析,揭示了理性化存在的问题,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理性化带来的困境绝不仅仅是效率与道德的两难选择,这种困境在韦伯的思想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

显然,施路赫特分析了韦伯思想中涉及的一个重要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发生关系总是要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最初是神或上帝等某些信仰对象,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纽带逐渐被科学所代替。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由人一神(上帝)—世界的关系转变为一科学—世界的关系。在

①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②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这个关系中人是总是会被联系他和世界的纽带所控制，而人的处境总会流落到要摆脱这种控制的局面。相反，这个纽带又总是僭越了它本身的功能，总是企图将发明或创造它的人控制于股掌之中。从本质上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异化问题。而我们要考虑的是究竟这种反常的人—纽带（上帝或科学或者其他）—世界的关系应该归罪于人，还是归罪这种纽带，抑或世界本身？我想，世界本没有错，它只是以它本来的样子，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纽带自身是人发明或创造的，它要为人服务，成为人的奴婢，可是它总是想成为人的主人。究竟为何？我想问题在于，当纽带自身的功能被人无限地扩大，它就不得不僭越自身的功能，将自身的奴婢地位摇身变为主人。说到底，人要为自身的不自由来买单。它的永无止境的意志与欲望淹没了自身存在的本性，也淹没了连接他和世界之纽带的本性。

苏国勋也曾对理性化的限制问题进行过分析。在《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中，苏国勋论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中在对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分析中有“现代社会的二难抉择”一节。苏国勋认为，韦伯从对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或者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二元对立入手，认为理性的二元性是现代社会两难处境的根源。他说：“韦伯的社会学分析就是循着这一思路进行的，合理性的二元性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的两难处境贯穿在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中，它统摄了整个社会生活。”^①“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二难推理是一个使韦伯长期感到困扰和痛苦的理论难题，也是他最终对社会生活理性化发展的前景持悲观主义态度的思想根源”。^②在此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苏国勋具体分析了韦伯在经济行为和官僚制问题上指出的二难选择。显

①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②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